

风雨兼程

——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建与社会演进

党庆兰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风雨兼程

——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建与社会演进

党庆兰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风雨兼程：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建与社会演进 /
党庆兰著.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311-05507-3

I. ①风… II. ①党…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2547号

责任编辑 张雪宁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风雨兼程——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建与社会演进
作 者	党庆兰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press.lzu.edu.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春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6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507-3
定 价	98.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政治革命与社会转型	013
一、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	013
二、中间政派的政治追求与中国政治演进的内在逻辑	025
三、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行政主题的贯彻 与国家政治机能考验的完成	039
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环境与现代化进程	049
第二章 民族抗战与国家重生	060
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060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抗日战争进程	070
三、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战况演变与抗战特点	091
四、中国抗日战场与日本“北进”战略的历史命运	121

第三章 国家战略与区域开发	134
一、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战略与西北工业建设成就	134
二、现代中国西北开发的时空构建与自然环境评估	145
三、开发的多主体培育与中国西北开发远景	156
四、西北开发的道路选择与开发应彰显的战略纵深和大国思维	166
第四章 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大国的缔造	177
一、“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与民族国家学说的创新	177
二、经济大国的建立与“中国道路”的思想精髓	193
三、时代机遇与现代中国新阶层的成长	210
四、人才大流动与当代中国跃进的内在动力	233
第五章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247
一、当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的解冻	247
二、关系解冻前夕中美的和解心态与互动策略	257
三、尼克松访华的策略设计与访华的政治效应	284
四、建交前夕中美谈判与两国合作的战略思维特性	298
结 语	313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8

1999年。从1949—1999年，整整50年，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视角来考察，可分为五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建设道路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从时间上说，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时期，1953年1月至1956年9月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年10月以来是改革开放时期。

第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完成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这一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大陆，建立了各级政府，取缔了西方在华特权和利益，没收了官僚资本，统一了财政经济，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逐步改造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科学和文化，恢复了国民经济。此外，还与苏联签约结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实现了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的恢复，成就比较大，到1952年，工农业生产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就为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三大改造”准备了条件。

第二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编制并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进行“三大改造”即对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政治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对外关系方面，倡导并实施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在军事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开始起步。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经济发展比较快，效果比较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建立了一批基础工业。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

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①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一切，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时期，是当代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经济、社会等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经济上曾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现象，但很快得到纠正，影响不大。总地说，比较正常。

第三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运动，纠正“左”倾错误，调整经济，克服经济困难。此外，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主题比较单一，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道路比较曲折，政治运动比较密集。从整体上说，这10年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在这一时期，国家的主导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培养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工作经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建设很快偏离了正确方向，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后来是以快为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及实施，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等“左”倾错误，导致了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从1960年下半年起，中央开始调整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1965年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甚至还有所发展，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实际上，这是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关于这10年的评价，应着重把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断：“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此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

^①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

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此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①在肯定10年成就的同时，不能忽视历史的另一个方面，即违背了八大的路线和“左”的发展。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来看，10年间没有彻底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的“左”的错误的积累，逐渐压倒了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造成了长达10年的内乱。

第四时期的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为标志，“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全国呈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一切都被推向极端；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9·13”事件即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调整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1973年，邓小平复出，并于1974年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后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中断；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于10月6日采取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文革”结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全国局势以乱为主，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灾难。

在“文革”的10年动乱中，始终存在着对“文革”错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广大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共同奋斗，使得动乱的破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经济虽然遭到重大损失，但仍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外交方面，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启动，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①促使我们下决心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教训,教训变成了发展的动力。

第五时期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革”结束后,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部分地纠正了“左”倾错误,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教科文重新开始走上正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就此起步。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从农村到城市。同时,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实现了中美建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等。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比较大。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改革比较顺利。1978—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7%。

改革开放,总体上说比较顺利,但也有阻力,有时阻力还很大,主要是“左”的干扰。从“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影响比较大的“左”的干扰有三次,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89—1991年,主要是提出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影响比较大,私营企业人心惶惶。据统计,1989年,全国个体户及其从业人员同上年相比均下降15%以上,私营企业减少了50%。1989—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5%。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

① 鹿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①邓小平关于防“左”和姓“资”姓“社”的谈话，在理论上冲破了禁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上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左”的干扰是在1995—1997年，主要是提出，发展经济要问一问姓“公”还是姓“私”，抨击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这是上一次姓“社”姓“资”的一种新的提法。这次干扰，后被十五大中断。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再获新的动力。

在分期问题上，学术界还有诸多观点，均有其依据。^②

二

现代中国史是从1949年开始的，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段历史一直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② 在分期方面，学术界还有诸多观点。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划分，分为四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1949年10月至1956年8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史的转折（1976年10月以来）；依据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变化来分，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时期（1953—1956年）、建设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6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以来）；以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脉络为依据来分，可分三个时期，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及受挫（1957—1976年10月）、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1976年10月以来）；以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为依据来划分，可分三个时期，即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49—1956年）、探索中国式道路时期（1956—1978年）、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78年以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分为两个时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1949—1978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1978年以来）。

是有史无学，真正进入学术领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这段历史留下了前无古人的深刻印迹，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的历史所不能比拟的，再加上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研究现代中国史的意义显而易见。

首先，资政功能强，能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实现长治久安。今天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宽容的雅量，这使我们可以从容地看待过去，公允地总结利弊得失。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长足发展，社会日益开放，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化，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国情的这些变化，需要我们深化对中国现代化特殊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需要有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在这个背景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就显得格外突出，意义格外重大。当代史，作为现实政策制定的直接背景，通过对过去政策利弊得失的分析认识，获得历史的智慧，摆脱现实的认识局限，具有显著的资政功能。现代史的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其次，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服务，为社会发展指引方向。现代中国的命运和发展与我们自身的命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生命力在于为现实服务，要为现实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今天，我们最伟大的事业是现代化建设，谁投身于这个事业，谁就有出息。对现实，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对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无动于衷。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现代化建设。所学的东西，跟现实联系得越紧、靠得越近，越有价值。为学历史而学历史没有意义，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没有意义，与现实无关的学问分文不值。有人认为，历史学出现了危机，受市场冷落。我们认为，受市场冷落不一定是危机。受冷落才正常。除“文革”时期外，历史学永远不会像经济学及其实用分支那样成为显学。然而，目前受冷落，还要先从主观上找原因。如果历史不敢直面现实的话，那就理应被人忘记。但仅仅适应现实的一种历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所

以，历史学既要立足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既要为现实服务，又要为社会发展指引方向。

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世界，这个开放性增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共生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这种开放性、世界性、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如同人的器官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不走进世界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不保持和弘扬本民族的“个体”特色、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基础，从而在对世界的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从这个方面来说，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责任重大，它必须既要立足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为国家的发展指引方向。

再次，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现代史是正在沉淀但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的历史，是已有了公共性质但还没有完全公共空间的历史，是刚刚进入研究领域的新历史，学科构建尚未完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种文史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畅销不衰。这说明了，在我们精神生活领域里，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现代史叙事论事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存在于纸介、影视和网络等有形载体，也存在于思想言论的无形载体中，容纳着个体的和官方的、学术的和大众的、公开的和私下的种种历史言说。可以说，现代中国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举世罕见，在它的叙事空间里混杂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各种言说。其中，既有严谨的科学之论、探微之作，也有大量的因袭旧说、重复雷同和粗制滥造的读物，还存在着许多造成误记和误读的情况。^②在此情况下，史实的拮取和史料的鉴证都

①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②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第7页。

是原创性的，具有开拓和奠基意义。

当然，现代史的研究自有难处，比如，与现实关联密切，政治敏感度较高，受现实政治环境影响较大，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有着相同的言说语境和相同的政治禁忌。还有，与现实社会之间缺乏历史距离感，存史论史掺有主观的断见。^①在史料方面，既有头绪繁杂的问题，也有史源不足的问题。面上的材料似乎是铺天盖地、浩如烟海、状如乱麻、线索繁杂，难以梳理出头绪，但能够揭示历史内幕的核心材料，如档案材料和记录历史关键人物活动的历史资料等，又受到档案解密开放的限制。在历史某个片段上的个体记忆，还是零碎的、片段的和感性的。在自然叙述的状态下，会带来把历史琐碎化的倾向，还需要进行历史整合，才能形成完整的集体记忆。^②在集体的历史记忆上，目前还处在一个感性阶段。当代史的研究，在历史整合、史实清理和史观更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最后，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可以提升全民族的文明水平。现代史是近距离的、现场感很强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有铭心刻骨的过去，都有自己荡气回肠的故事，都可以从国运跌宕起伏中找到自己沉浮其中的身影。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各种变化的政治风云图谱，还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极端色彩的人生百态。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善恶被发挥到了极致，给历史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自我反省的样本。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有可能成为绝本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对历史是非的检讨，对正义、理想、道德和人类情操的歌颂，弘扬正气，揭露丑恶，提升全民族的文明水平。

概括地说，在现代中国史领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知识资源，有着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要将历史的片断复合成历史的整体，将个人的历史记忆整合为群体的历史记忆，将历史的感知上升为历史的理性认识，不仅要有学者

①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第5-6页。

② 传承中国文化命脉，塑造集体记忆，实施公民教育，强化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等，都是中国史研究所担负的使命。

个性化的研究，更要有高层政治的核心研究；不仅要有传统史学的学术规范，更要有史观的更新，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三

现代中国史是我们身边的历史，有很多内容还是现实政治，决定着我们的政治生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程度较高，研究就更加严肃。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发展的主流。

对现代中国50年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和错误，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必须认识到，在这50年中，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在前30年里，我们历经曲折，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制度保证、物质基础和建设经验；在后20年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出现过严重失误，遭受过巨大挫折，甚至一度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过灾难。但与成就相比，失误和挫折是次要的。肯定成绩，承认过失，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心理，有敢于面对过去、立足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勇气。

第二，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没有今天这个水平，国防建设成就也没有这么多，国内生产总值不可能年均达8%以上，甚至9%以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大地上一望无际的楼群、宏伟的立交桥、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密如蚁群的车流，普通百姓的餐

桌就没有今天这么丰盛，也没有随处可见的五彩缤纷的服饰，更不会有高等教育今天的这个规模。

对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和食品安全等，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在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后来他们慢慢地在某种程度上医治了。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解决的任务。”^①我们也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落实的任务。我们搞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目标，这就是我们能落实的任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不出现问题才不正常，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那点儿问题而否定改革。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前也有问题，只是问题不同而已。改革开放前，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消息闭塞。今天，传播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大家获得的信息也比较多、比较快。今天，问题是有，但我们不能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我们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而应进行新的改革。改革是一场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几天或几年之内完成。

还有，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贫富分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大家都比较穷，没法儿分化，即使分化，距离也不会很大。现在财富多了，分化起来距离就大了。其实，这很正常。我们搞的不是平均主义，不可能大家都一样。改革开放后，贫富出现分化，一提起两极分化人们就害怕。其实，两极分化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使贫穷阶层不再贫穷，怎样通过政府的手对国民财富进行第二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富的共有共享。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所带来的问题相比，成就是大的，问题是小的，二者不成比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完美无缺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第三，研究要紧跟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国家意志是最高意志，国家战略是最高战略，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现在，政府的导向很清楚，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研招标都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我们要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步紧跟。历史研究不能自言自语，不能仅仅是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历史要和现实对话，解答时代课题。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最重大的课题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社会实践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①这一变迁，必然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课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第四，立足点要高，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关于立足点，要尽可能地站在时代所提供的高度上。高度和眼光成正比，站得高看得远。如果立足点太低，目光就不可能远大，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这段历史。至于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精神上的东西。“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景仰和敬畏就越是时时翻新、有增无已，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②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精神世界值得领略，要在精神世界里为上述这段现场感很强的历史留有一片星空和希望的田野，对这段历史保持着由衷的热爱和敬畏。

①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② Immanuel Kant,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heophania Publishing, 2011, p179.

第一章

政治革命与社会转型

在20世纪中国社会编年史上，有着三次重大转折。辛亥革命根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完整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制度创新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改革开放则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使中国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初步繁荣。

一、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

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重大社会转型。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这三次转型，都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跨越。第一次转型，无论是把它划进中国近代史还是把它并入现代史，^①其意义都是划时代的。第一次转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根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还在于基本上完成了中

① 有的专家和学者把第一次转型的开端辛亥革命划进中国近代史，比如王文泉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陈旭麓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和程舒伟著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有的专家和学者则把第一次转型的开端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现代史，比如秦英君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秉扬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陈廷相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